

姑射烽火

荀玉英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姑射

GU YE FENG HUO

烽火

◎ 荀玉英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序 言

山西临汾乃是帝尧古都，出临汾市西南有一片方圆 40 平方公里的山脉，名曰：姑射（y è）。姑射山又名老爷顶，海拔 1890.8 米，是吕梁山的支脉，姑射山下的汾西县是一个山区小县，北连吕梁市交口县、晋中市灵石县，南接洪洞县，西依姑射山与隰县、蒲县接壤，东邻汾河与霍州相望。

汾西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大部分地区有成片灌木林和树林分布，不便于坦克、汽车等大部队通行，有利于部队隐蔽，是天然的防御地区，所以，这里是人民力量的储备地；是和日蒋阎玩“躲猫猫”的隐藏地；是能文能武的英雄出生地。

1937 年，当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姑射山周围先后驻扎过土匪、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和游击队。

从 1936 年到 1946 年 10 年间，汾西就先后成立了红军游击队、汾西抗日游击支队、汾西游击大队、游击十二团、“方山部”游击大队、小洪赵支队、“还干部”游击队（意为汾西人民还在干革命）、汾西基干队、太岳抗日义勇大队、汾灵霍大队、汾西县抗日救国农民总队、汾西保乡队、汾（西）蒲（县）游击大队等十几支人民武装。

先后活动在汾西大地上的一批诸如邢士贞、李妙斋、贾长明、刘成德、任钟灵、刘金龙、荀书林、孟清俊、马秀珍、郭来生、王瑞珍等革命者们，他们不顾惜个人的生命，频繁出入敌占区，英勇无畏地和敌人做着生死斗争。

我从小耳濡目染了身边许多抗日故事、英雄传奇。一开始，我被“汉



奸”的称号给唬了；后来，我又被某些人不屑地“土匪”评价吓坏了；再后来，我深深被历史吸引了；稍稍一理顺脉络，我笑了。

我愿意了解他们，愿意在他们的叙述中感受什么是残酷；什么是亲情、友情；什么是爱国、爱家……面对日、阎的肆虐，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什么能存在于汾西多年不被破坏？日、阎等部队为什么在汾西站立不稳，甚至被瓦解？汾西人民也因此而少经受了多少磨难？种种原因之外，我固执地认为，这是刘荀部队这伙“土匪”的功劳，这是他们上蹿下跳，东奔西走，流血、流泪、流汗换来的。

见证了亲历者及其亲属痛哭流涕的叙述，再后来读了历史资料，一种强烈的愿望揪扯着我，我要写，写我的傅爷爷，写我的荀书林爷爷以及和他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战友们，他们有的早已牺牲，有的在冤屈中郁郁离去，知道这部分历史的人接踵老去，记忆纷纷飘零，有的则不愿触及心灵深处的痛，有的已经无法回忆起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后来有幸访问到原民政局局长李厚云，退休老干部刘炎田、郭奇珍、郭长福、樊文采等人一起聊天，知道了他们了解的一些东西，及他们对历史的评价，使得我写此文时更加客观、更加理性。

十几年不算长，一睁眼一眨眼的功夫就如烟云再也回不来了，但十几年来在枪林弹雨中穿越，的确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耳濡目染这段历史至今已经三十年，从2010年冬天开始，我调动所有能量笨拙地记录下英雄们的事迹，以便更加彻底地感受英雄们的不凡。缅怀英雄的卓越功勋，追思他们的崇高风范，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的可贵精神转化为自身强大的动力，为实现“中国梦”齐心协力，勇往直前。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怀念。

因写作水平太有限，对历史事实的把握并不太准确，对故事的艺术加工很不到位，因此未敢腆着脸请人作序，只好自说自话，是以为序。

引子一（上） 侵略者肆无忌惮 爱国者奋起反抗

故事从“五卅惨案”说起。1925年2月5日，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斗争，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红旗、横幅，义愤填膺地走上街头，强烈反对剥削和压迫，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

他们不重视中国工人的实际利益，经常欺负和压榨他们，罢工开始后帝国主义者采取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各个击破，试图将罢工镇压下去。5月15日，上海棉纱第七厂日籍职员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引发了工人再次罢工反抗。租界当局还损害中国工商业的利益，宣布要在上海增加码头，实行交易所注册等，这就进一步激发了全市人民的愤怒。

5月30日，上海各校两千余名学生，到公共租界举行示威，他们举着“打倒国内外的军阀、政客、奸商！”、“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废除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条幅，呼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中国爱国青年都集中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的口号，齐刷刷地走上街头向当局表示抗议，近百名学生遭巡捕逮捕。

当天下午，上海群众近万人集合在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学生，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当场打死打伤许多人，50余人被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斗争迅速扩大到广大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各阶层人民中去，展开了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山西省城太原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支持上海人民的斗争。



“五卅运动”给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以重创，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太原民众自尊、自强、自爱、自立意识，提高了人民觉悟，加强了民族团结，促进了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到汾西。凡属有血气的人，孰能袖手坐视？汾西最早的群众革命组织“汾西农民协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1925年7月，汾西县在太原上学的进步青年邢士贞、王奋山和共产党员范毫，联络了几位外县的同学，利用暑假期间返回汾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他们组织了汾西第一高小和附属初级师范学校的300余名师生们在县衙内的大堂开会，汾西二高（勍香）及三高（干河，现属洪洞）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大会。他们通过这几个学校的骨干，宣传革命道理及反帝、反军阀的意义，讲全国的革命形势，在师生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县政府派警察试图阻止学生集会，但在遭到义愤填膺的学生们的痛斥后退缩。在会上，邢士贞、范毫做了激情澎湃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

邢士贞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讲道：“……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谁也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发生，但也绝不惧怕战争的威胁，每一位中华儿女都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正所谓精忠方能报国，无国又何以成家，无家何以兴国？国不兴则被人欺凌。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摒弃自尊，卑躬屈膝，对霸权者低头俯首称臣，这是可耻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民，炎黄子孙，又岂可屈服于敌人的武力之下？咱们所有中国人团结起来，哪怕是每人打一拳、踢一脚，也可以把敌人挡出去，把外国人赶出中国，不再受他们的欺负，咱誓死不当走狗，不当亡国奴！”

下面有人跟着喊：“讨还血债，誓死为中国人报仇！”

“讨还血债，誓死为中国人报仇！”

“打倒军阀，反对贪官污吏！”

“打倒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声响此起彼伏。

会场里不时有骚动，学生们群情激奋，议论纷纷，一个穿着很讲究的青年不无担忧地说：“外国人坚船利炮，咱们恐怕打不过人家！”

一个穿着朴素整齐的青年气愤地回击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你甘心让自己的同胞受外国人的欺负？”

穿着讲究的青年红了脸不再吭声，这位穿着朴素的青年继续说：“咱和狗日的干，一人一棍子也要把狗日的撵出中国去！我就不信，外国人是铁打的？我贾学孔坚决不当亡国奴，就是死也不让狗日的占便宜！”

穿着讲究的青年没有接话茬，向旁边走去。

旁边有人附和道：“他狗日的敢负咱，咱就敢往死里整狗日的，不信就试试？”说完，还举起了拳头使劲向前挥去，仿佛前面就是日本人。

.....

贾学孔又接了一句，“我还不信啦，日本人是狼？咱中国人全是羊？”

许多人气愤地道：“他狗日的猖狂不了几日！”

会后，师生们群情激奋，热血沸腾，他们跟着邢士贞、范毫等人沿县城大街举行了游行示威，举着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地”。

“打倒军阀，反对贪官污吏！”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为了祖国，我要用手中的武器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

口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街道两旁挤满了观望的群众，不少群众也被感染，爱国热情被唤醒了，大家呼啦啦一下子越聚越多。

一些大胆的群众自觉参加到了游行队伍中，大家喊着口号顺着大街向东门走去，还有一些妇女孩子看红火热闹，也兴奋地跟着队伍向前走，这其中就有十岁的荀书林，他跟着父亲进城正好碰上了游行队伍，他兴奋地又蹦又跳，在人群中串来串去，时不时跟着喊两声，他父亲是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将他从人群中拉出来，大声训斥道：“你个臭小子，懂个屁呀，瞎胡叫嚷啥呢？以后不准你跟着别人瞎起哄！”

荀书林背着手、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着父亲的训斥。等父亲训斥完，默默地跟在父亲身后，好奇地向人群中张望着。父亲看他，他赶紧低下头，目不斜视地走路，父亲一不看他，他的眼睛便好奇地在人群中转来转去。

游行过后，邢士贞、王奋山、范毫发起组织成立了“汾西县农民协会”。参加协会的成员有苗洼村的柏玉生、僧念村的李丰年、府底村的郭鹤迎、店头村的王玉玺、白衣村的郭庆祥等人，会址设在县城北街付铎的院内。

“农民协会”成立后，在全县农民中宣传革命道理，发动各村都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委员会，动员全县人民开展反帝、反阎锡山政权的运动。

县城学生组织游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县，大要沟村也有人在传递这个信息，“太原回来一伙学生在城里组织学生造反哩！许多人跟上在街里游行了，说是要减租减息，打倒贪官污吏，赶走侵略咱中国的外国人了！”

老百姓纷纷相互转告，一时间邢士贞、范毫及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成了全县百姓议论的中心。荀书林也听村里的人聚在一起吵吵这个事，这时，幼小的他懵懵懂懂地记住了只有推翻反动派赶走外国列强才能使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

宣传人员在他们村庙上集合起许多人的时候，荀书林并不关注他们要干什么，只是觉得好奇，在人丛里挤来挤去，听宣传人员讲得慷慨激昂，大人们议论纷纷。

“靠咱这些土包子能赶走外国人？”

“要是大家全团结起来打狗日的，几个外国人算个啥？”

“说的比唱的好听，抓住造反是要杀头的！可不敢跟上生是非。”

“只要地主不剥削咱们，自己种多少粮食都是咱自己的，吃饱穿暖就好了！”

“再怎么闹吧，咱还不是靠天吃饭？狗尾巴再翘吧，还能翘得上了天？”“就是，咱婆姨娃娃热炕头，其他的事咱管不了！”

“要是赶不走外国人，推不翻地主阶级，咱能有好日子过？”

“那是日本人没欺负到你头上，要是在你头上屎尿撒尿，我不信你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哼！”

“也晓得他们说的这些能推行下去吗？要是吵吵几天事没干成，咱还跟上受了连累，多不划算？”

“是呀，谁知道怎么做对呢？先看看再说吧。”

农民协会看的人多，报名的人少，尽管这样，但也算是轰轰烈烈成立了。汾西的“农民协会”成立后不久，蒋介石镇压群众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员，在白色恐怖下，邢士贞、范毫、王奋山不得不立即返回了太原，由于主要领导离去，大部分协会的头头又不想出头露面，怕惹出事端，协会里的成员更是缩头缩尾，生怕协会惹不起地主阶级，反倒让人家报复，家人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各种怪话就出来了，“我就晓得成不了事，你们要跟上胡闹哩，还不赶紧退出来老老实实过日子？”

“说得容易做的难，从老辈子起，吃苦受罪的还不是咱这些平头百姓？怎么造反吧，咱还不是受苦的命？”

“你看谁谁谁就日能的多了，农民协会他第一个报名的，做成啥事了呢？还不是灰溜溜的在家种地？有本事当官去呀！”

“比咱有本事的人多的多了，自己还晓不得自己有几斤几两？”

“就是，咱安安分分种咱的地，过咱的光景，有本事人做的事就不是给咱兴的，跟上白‘日混混’上几天能怎么办呢？”

汾西地方小，人和人之间牵扯着方方面面的关系，许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协会的工作没有能够按原定的计划开展起来，一些参加协会的积极分子倒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有些甚至被人们长期冷嘲热讽、到处宣扬落井下石，仿佛自己有未卜先知之明，而那些人都是十足的大傻瓜。

但尽管如此，那次活动在全县人心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些不甘在穷困潦倒、受人欺凌中生活的人开始寻求走出这一现状的道路，农民协会在汾西青年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尤其是十多岁刚能懵懵懂懂知晓点事的半拉孩童们，向往着吃好的，穿好的美好生活，革命火种点燃了他们胸腔的热血，在动荡年代中逐渐沸腾，反抗暴政、反抗日寇。他们的革命热情又影响了一大批人，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和一切不平等抗争。

引子一（下） 长明上学求真理 办事仗义有底气

邢士贞、范毫等组织发动县城学生游行时，北掌村在县城一高读书的青年贾学孔也参加了活动，并且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沿，带头呼喊口号。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回村时经常带一些宣传革命的传单，向村里的年轻人讲革命的道理，以贾长明为首的十几个男孩经常听贾学孔的宣传。

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老百姓贫穷，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国家落后，是因为我们受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反动军阀的统治。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革命，就要学文化、长志气，因此，他们产生了要读书的迫切愿望。但当时县上规定，一个团（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才能办一所“官学堂”，高小只能县上办，村里不许办学校。

当时北掌和冯村是一个团，学校在冯村，北掌的孩子因为家贫，路途远，路上常闹狼，大部分没有上学的条件。贾学孔建议村里的孩子们自己组织起来学习，由他抽空回来教，大家都说是个好办法。

1925年秋，北掌村近20个男孩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学习组织，取名“青年自治学会”，大家选举贾学孔为主任，贾长明为副主任。

学会成立时，全体会员在孔夫子像前做了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宣誓，并表态说绝不坏事，即不嫖、不赌、不偷、不抢。规定谁要是干了坏事，即开除出会，学员中谁家有事、有困难，大家要互相帮忙，团结一致。

学会的学习内容有学文（识字）、学数（珠算）、学武（武术），平时自己组织学，贾学孔隔一段时间回来讲一次课，其余时间自学，学得快的教学得慢的。

天暖时每人自带个板凳在场院里学，天冷了集中到一个房间坐在炕上学，大家纳煤取暖。这样坚持了三年，尽管教学断断续续不规范，但这些孩子都识了不少字，学会了珠算的基本运算法，武术的套路也掌握了不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1926年冬至1927年春，贾长明参加了本乡壮丁，学国术（武术），1928年被选为不脱产的闾长，任期一年。贾长明将自己学到的武术无偿地教给了本村的伙伴们。

1929年组织过农民协会的王奋山又返回汾西，带回些进步书籍，召集蔡茂林、马呈书、郭兴祖、王裕嘉、侯度、付铎等人成立了“汾西县自治促进会”。该会订有《红旗周刊》及《上海报》等进步刊物。每周召集会员进行一次学习座谈。会员人数逐渐增加到四、五十人。这个组织活动不到三个月，即被当局查封。

当时，这一活动在乡村仍然展开，尤其是北掌村的青年自治学会，更是到处寻找进步报纸、书籍阅读，然后相互宣传革命思想。

荀书林当时也在贯里和大要沟等几个村组成的团学校里读小学，教书先生是一位思想进步的中年知识分子，经常从外地借回来一些进步刊物，将其中一些革命道理讲给他们听，还借书给那些爱看书的孩子阅读。荀书林在这期间接受了大量的道德教育和革命思想。

贾学孔从一高毕业，分配到外地当了教员，不能回村讲课了，“青年自治学会”因此而无法继续学习。这时，贾长明提出北掌和南掌联合办一所小学，可是团里阻拦不让办。他们去找县政府教育科，教育科长支持团里的意见，不允许办。他们连续找了三次都不答应。

贾长明就组织两个村20多名青年集体到县上交涉。到县政府后，大伙齐刷刷地席地坐在院子里，贾长明去找教育科长谈，教育科长看到一伙人在院里吵吵嚷嚷，急着去找县长请示，县长害怕这些人闹事，应承让两个村办一所学校的要求。

“青年自治学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也因此在全县出了名。不少村的青年都效仿成立了青年学习组织。柏支原村的刘金虎在他们村成立了汾西第二个“青年自治学会”。

之后，店头、对竹、王堤、下庄等村也相继成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些村的青年相互联系，交流学习经验，形成了一股积极上进的力量。

继与县政府斗争争取到办学校的准许后，北掌村“青年自治学会”在冯村团的村长选举中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1929年春，冯村团的七个自然村要选村长。贾学孔和贾长明商量，决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以“青年自治学会”为核心，发动青年选举自己人当村长。而团里的旧势力也联络了一批地主绅士，活动选他们的人。

这些人得知“青年自治学会”的意图后，便到县政府告状，说他们有不法举动，要组织老百姓闹事，破坏选举。县政府担心事态扩大蔓延会触及到政治，决定整治一下闹事的。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青年自治学会”的活动与贾学孔有关，便派两名巡警准备在选举开会时教训贾学孔，让他当众出丑，以打乱“青年自治学会”的行动计划。这消息传到北掌后，贾学孔和贾长明商量，决定开会那天如果巡警真来，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将他们揍一顿赶跑。

选举会那天，会场上很热闹，大人说说笑笑，小孩打打闹闹，县上真的来了两名耀武扬威的巡警，虚张声势地维持着秩序。因为平时人们除了赶会看戏，没有啥娱乐活动，好不容易开个大会，人多自然热闹。

还没开会，一个半大小子和伙伴们你追我赶，不小心将会场上的一张桌子碰翻了，巡警抓住那小子不放，扬言要押起来等开完会才能放，他们本意是吓唬吓唬贾学孔等青年，可没想到那小子的哥哥正好是自治学会的成员，立马和抓着他弟弟的巡警吵了起来，另一名巡警来帮他们的人一起吵。

在他们的印象里，村里人都是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不想却碰上了硬茬，自治学会的青年们一窝蜂地围上去呐喊助威，并借拉架将两名巡警揍了一顿，没等选举正式开始，巡警就被整了下来，一个个鼻青脸肿狼狈不堪。

巡警挨打后，色厉内荏地嚷着说要回警察局报告，灰溜溜地走了，他们企图破坏选举的阴谋被几个土包子青年轻而易举地破坏了，地主绅士们失去了依靠，选举过程相当激烈，很多人虽然也想选青年自治学会的青

年，但害怕他们成不了事，习惯性地选举了旧势力中的能干分子，虽然旧势力的代表当了村长，但贾长明也在青年自治学会会员和个别思想激进分子的选举下当了副村长。

不久，村长挪用了团里的一笔公款，贾长明暗中指派人到县政府告状，县政府查实后，撤了村长的职，贾长明随即顺理成章地当了村长，青年自治学会通过斗争掌了团里的权，成了为民做主的靠山。这样，青年自治学会的名气更大了，一次次斗争的胜利，使他们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他们团结在一起，相互帮衬着家里，农忙时锄地收割，农闲时一起学习，小日子过得稳定而安逸。

北掌青年自治学会坚持了五年，会员们在文化、思想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他们认为，要想干点事，靠在村里自学的那点知识是远远不够的。

经过大家商议，贾学孔建议让一些有条件上学的骨干报考高小，其他人继续在村自学，由上了学的会员抽空回来辅导不能去上学的同学，同时要继续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在贾学孔的安排下，贾长明和另外三名家庭条件较好的青年考入汾西县城一高十七班。因贾长明当年已经 22 岁，只能瞒报 5 岁年龄才进入学校。因他见多识广，思想超前，上学不久后写了一篇《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文章，得到老师的赞扬，并被学校作为范文而张榜全校。

1929 年 8 月 24 日，曾和王奋山一起组织过农民协会的邢士贞，辗转各地做革命工作，因叛徒出卖，和澎湃等人同时被捕，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但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绝不背叛革命。

面对死亡威胁，他说：“死不了就要干革命！”，他坚定地表示“你们蹦跶不了多久，共产党一定能够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

8 月 30 日，最后的时刻到了。他与战友杨殷、颜昌颐、澎湃 4 人高唱《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

不久后，邢士贞的死讯传回汾西，进步人士为其悄悄举行了悼念活动。贾学孔也组织青年学会向大家说明了邢士贞的英雄事迹，并一齐向邢士贞的家乡邢家要乡鞠躬行礼，悼念这位汾西人的好儿子。

1930年夏，在中原爆发了蒋介石和阎锡山大战，山西当局也加紧对人民剥削勒索，晋钞猛跌，物价飞涨，全县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此时号称“天字号”的汾西唯一官办盐店便趁机欺行霸市，盐价比平时贵了将近二十倍不说，买盐还得凭关系走后门，致使全县人民吃盐成了很大问题。

村里人盐罐子里空荡荡地，做了饭寡淡无味，当即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慨，尤其是一高附属师范的学生，他们星期天放假回到学校后相互一沟通，个个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在贾长明和一名叫赵青的同学领导带动下，组织青年学生联合起来，冲出校门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冲衙门、砸盐店，痛打阻拦学生行动的警察，和县当局据理力争。

经过激烈的斗争，县当局只得向学生妥协，答应凭学生开具的条子买盐，才使得穷苦老百姓有了盐吃，贾长明也得到了青年学生及百姓们的拥护。

当时汾西一高校风不好、教学秩序比较混乱、学生中宗派严重，经常闹纠纷。有一次，学生中一个富家子弟欺侮了一个穷学生，几个穷学生打抱不平揍了富家子弟，校长为讨好富家，开除了师范班班长赵文献。这事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联合起来罢课，要求驱逐思想保守、治学无方的校长。

贾长明被学生推选为代表。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到县教育局请愿，要求罢免校长，把校长的行李铺盖扔到大街上，校长吓得跑到县衙里躲了起来，但是，由于县当局和校方做分化瓦解工作，将学生代表各个做思想工作，思想不太坚固的吓唬吓唬就不说话了，思想较坚定的就威胁加逼迫，学生内部乱了，几个主要负责组织闹事的学生代表之间也出现了分歧，主张不闹的占了多数，主张闹下去的势单力孤，有几个班的学生在校方的哄骗下复了课。

贾长明看到这场学潮将要夭折，便团结几位学生代表，商量对策，深入到学生中做组织宣传工作，揭露县当局和校方的阴谋，诉说贫苦学生长期受欺凌的事实，讲明团结起来才能不受欺负的道理。把学生们重新组织了起来，并积极争取到社会上开明人士和群众的支持，重新开始了罢课。

经过二十多天的斗争，县当局最终被迫罢免了校长，学生斗争取得了

胜利。而贾长明也因领导了这次斗争成了一高的学生领袖，在师生中树起了很高的威望，一时间成了全县的知名人物。

然而，枪打出头鸟，县当局和旧势力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把贾长明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新来的校长更是把他当成了心腹之患，生怕他再领头闹事，让自己下不了台，所以，总是处处找茬想整他。

一天，贾长明因长了一身疥疮，浑身疼痛，不能出操跑步，去找校长请假。因校长未起床，他只好站在门口等着。校长起床后，出门看了贾长明一眼就匆匆上厕所去了，早操完了才从厕所出来。

贾长明等于没有请假，校长见面就质问贾长明为什么不上早操，贾长明申辩说自己有病，正在等候他要请假，校长非但不听，反而在当天下午贴出一张布告，宣布贾长明违犯校规校纪，不上课不请假，要开除贾长明，在全校引起了轰动，学生们对此强烈不满，嚷着要去找校长说理，有的还提出如校长不纠正就罢课。

贾长明怕把事情闹大了，影响同学们的学习，甚至会有更多的同学受到处分，劝大家不要闹事，他自己去找校长讲道理。这时许多老师也议论纷纷，说校长开除人没道理。校长见势不妙，忙向贾长明承认错误，收回了那个决定。

贾长明考虑到校长这次虽然没有整了他，但已把他看做是威胁，以后肯定不会放过，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找茬刁难自己，今后还要有小鞋穿，他在一高不好呆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不得不转学，在樊玉堂的介绍下，几经周折终于转到了霍县二高。贾长明到了霍县二高后，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于日寇之手，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各大城市纷纷组织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政府抗日救国。霍县二高的一些热血青年，也酝酿组织抗议活动，贾长明平时正直勇敢，敢于仗义执言，在同学中威信极高，许多同学都听说贾长明在汾西就是学生领袖，又能说会道，就把他选为代表。

贾长明和其他几位学生代表一起组织霍县城里几所学校的学生上街游

行示威，他还在鼓楼前发表了热血沸腾的演讲。之后又组织学生们下乡宣传，领导开展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动，活动成效相当显著。他随之成了霍县妇孺皆知的新闻人物，霍县人都知道，在城里带领学生闹事的是个汾西娃！

贾长明于1932年夏从霍县二高毕业。在高小念书二年，他懂得的革命道理更多了，眼界更开阔了。高小毕业回来后，青年自治学会的同学又经常来一块聚会，开展一些读书、讨论、互帮互助活动。

1933年秋，在贾学孔的倡议下，刘成德、任钟灵、刘金虎、陈桂芳、贾长明等十多名青年，在店头村的庙里集会，效仿桃园三结义，按年龄大小排序，歃血为盟，结拜成异姓兄弟。

大家义气干云，热血沸腾地在写有共同志愿的纸上签名，意思是为了救国救民，反帝反军阀，要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同生死，共患难。后来他们还多次商量，要以梁山好汉为榜样，杀富济贫，同旧势力、旧制度做斗争，他们选取姑射山为聚义集散地，但当时山上驻扎着一伙杀人越货的江湖抢匪，而且，自个的亲人也不同意等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

北掌村的青年自治学会先后坚持了十年之久，它虽然是青年们自发成立的学习组织，但在学文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宣传革命道理、教育青年、组织青年的作用，同时在全县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推动了全县青年运动的开展，使不少青年从愚昧无知、浑浑噩噩，甚至自暴自弃走上了自立自强的道路。

这些人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成了领导汾西县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不少在建国后担任了地、县主要领导，有的成了我党高级干部。上面提到的刘成德，1907年生于汾西县赵村。刘承德去北掌姐姐家时，结识了贾长明和青年自治学会的其它成员，通过接触，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和贾长明成了知心朋友，他们志趣相投，日后化名老庞、庞明公、庞小狗，为救国救民奔波了一生。

邢士贞、王奋山和共产党员范毫在汾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贾学孔、贾长明、任钟灵、刘成德等有志青年将这革命的火种传递下来，刘金龙、荀书林等革命志士将星星之火在汾西及周边地区燎原。

引子二（上） 刘金龙崭露头角 硬骨头侠肝义胆

刘金龙，1916年生于汾西县柏枝原村，中农家庭，家中姊妹五人，他排行老二，上有一兄，就是上一章提到的刘金虎，下有一弟名叫刘金彪，还有两个妹妹。

刘金龙兄弟三个都是英勇果敢的人物，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金龙金虎金彪子，弟兄三个挨刀子。”

刘金龙属龙，父亲给他起名叫龙孩，他生性顽皮，小时爱打架，因打别人家的孩子被找上门是常事，父母常因他在外面惹麻烦给别人赔情说好话，有时候给人家赔衣物、粮食、东西，常常被金龙闹得见了人都觉得自己欠了人家多少吊钱似的，他也因此没少听母亲的唠叨，没少挨父亲的打，金龙父亲家教很严，其他兄弟姊妹都很听话，只有他常受父亲的体罚，而金龙生就的一副硬骨头，不论怎么体罚，都不求饶，不认错。

八岁时，父亲送金龙上学，但他根本学不进去，不几天就把书撕得粉碎，上课时吵吵闹闹，顶撞老师，抠抠同桌的衣服，推推前面的同学，搅得别的孩子根本无法学习。父亲看他不是学文化的料，就让村里一个会武术的师傅教他学拳，他对练武倒很热心，不几天就将师傅教的几套拳术练得娴熟。

因为不读书，父亲就让他去放羊，他拿着一条鞭子，在羊群中走来走去，摸摸这个，拍拍那个，有时，羊相互打架，他就用鞭子打不听话的羊，不偏不倚，好像是管懂事的孩子一样。

有时哪只羊儿不听话，他就随地找块土坷垃或者小石头扔了过去，说打哪只羊就打哪只羊，把羊驯得服服帖帖，他给所有的羊都起了名字，只要他鞭子一响，叫哪只羊的名，哪只羊就乖乖地跑到跟前，不然就得挨他

